



红十字文化公园里的两尊“洋人”头像

□池子华

当我们徜徉在莱山区植物园东侧的烟台红十字文化主题公园时，会发现一尊被称为“希望之门”的雕塑，雄浑磅礴。雕塑的柱石上除了雕刻着烟台先贤——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两度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吕海寰头像外，还有两位“洋人”头像，也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另一位则是国际护理界的先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5月8日的“世界红十字日”和5月12日的“国际护士节”，就是分别纪念两位“洋人”的盛大节日。而他们的烟台“聚首”也颇有创意，新人耳目。

一段“不愉快的往事”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与“三个一”分不开：一个人、一场战争、一本书。一个人就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一场战争是索尔弗利诺之战，一本书为《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又译为《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亨利·杜南（Henry Dunant，1828年—1910年），1828年5月8日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中产家庭，法国传教士后裔。



亨利·杜南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1859年，作为商人、旅行家、慈善家的他，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事。6月25日，当他行经意大利的索尔弗利诺时，“想象不到的最可怕的景象”呈现在他的面前：“战场上布满了人和马的躯体；在道路上，在壕沟里，在峡谷里，在灌木丛中和田野上到处散落着尸体；尤其是在索尔弗利诺附近，更是尸横遍野。”原来，一场惨烈的战斗刚刚在这里结束，拿破仑三世统帅的约15万人的法国—意大利撒丁联军和弗朗索瓦·约瑟夫皇帝统率的数量相当的奥地利军队对垒交锋，“战线有15英里长，战斗持续了15个小时”，结果联军凯旋，奥军也撤退而去，4万多名死伤士兵被遗弃在战场上，血腥味弥漫。

杜南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面对“痛苦的呻吟和令人心碎”的乞求”，他尽了“最大所能在最需要的地方组织救护”，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伤兵带着遗憾死去。

10天后，杜南回到日内瓦。那段“不愉快的往事”激发他去“完成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事业”。他开始撰写《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

一本影响世界的书

1862年11月，《回忆录》在日内瓦出版。书中对交战双方残酷的厮杀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书中写道：“奥地利和法国—撒丁联军互相践踏，在血淋淋的尸堆上你奔我来，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步枪射击敌人，用马刀劈向敌人的头颅，用刺刀刺向敌人的胸膛”“马蹄践踏者死了的和快要死了的人，使这场景变得更加可怕。一个可怜的伤兵下巴没了，另一个头碎了，第三个本来可以获救，可是他的胸膛被踩得凹了进去。这时，愤怒的喊叫声、咒骂声、痛苦和绝望的呻吟声夹杂着马的嘶鸣声充斥着整个战场”“枪炮打在散落遍地的死伤者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人体被残害得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泥土混拌着鲜血，令人窒息。”细节的真实描写，不能不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震撼，不能不激起人们对人道、爱心的强烈呼唤。

的确，《回忆录》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法国记者龚古尔兄弟在《新闻》杂志中评论说，《回忆录》“每字每句都激起我深深的感触，给人以崇高的启迪。它的价值千百倍于荷马的‘史诗’，千百倍于其他一切名著。它是人类原始生活下为暴力摧残的真理的呼声，谁读过这本书，谁就会诅咒战争。”大文豪雨果写信给杜南说：“你武装了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自由。”

然而，杜南并不是为了追求单纯的“轰动效应”。他的崇高目标，一是希望能够在平时建立伤兵救护组织，一旦战争爆发即可“以真诚的博爱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用人道之光驱散战争阴霾；二是要制定国际规则为战争救护扫清障碍，否则博爱将无从谈起。这就是著名的“两大设想”。

诺贝尔和平奖首位得主

这两个设想很快变成了现实。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包括杜南在内的五人组成，史称“五人委员会”（1876年五人委员会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他们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奠基人，被后人尊称为“日内瓦五君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红十字组织的诞生。

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备一次国际会议，完成杜南的第二个设想。1864年8月8日至22日，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共同发起，在日内瓦召开由瑞士、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美国、英国、瑞典、撒克逊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另有4个日耳曼邦国——巴顿、海西、普鲁士、乌登堡的代表出席），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公约的基本准则就是“伤病员不分国籍必须被接收，并受到照顾”。也就是说，救护伤兵不分敌我，交战双方应对救护人员加以保护。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颠倒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救护及保护性标志。这就是“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红十字运动由此蓬勃发展起来。

1901年，杜南因其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作出巨大贡献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首位得主。1910年10月30日，杜南于瑞士海顿小镇逝世，享年82岁，而此时，他开创的红十字事业已在2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其中就包括中国。为了纪念这位“红十字运动之父”，194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把他的生日5月8日正式确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这就是“世界红十字日”的由来。

杜南心目中的“女神”

在《回忆录》里，杜南特别提到南丁格尔，并表达了对她书写战地救护传奇的崇高敬意。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年—1910年），现代护理学和护理教育的奠基人，1820年5月12日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她自幼好学，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完全有希望跻身上层社会，但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护理职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护士。在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她率领30多名护士从事伤兵护理。在她的精心呵护下，伤兵死亡率由50%下降到2.2%，创造出非凡业绩。每夜，她手提油灯巡视病房，被士兵亲切地称为“提灯女神”。战后回国，这位传奇式人物被尊为民族英雄。1860年，她用英国政府奖励的4400英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士学校——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在医院管理、军队卫生保健、护士教育培训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07年，她荣获英王颁发的功绩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南丁格尔更是杜南心目中的“女神”。《回忆录》写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英国的医院和欧洲大陆的主要慈善机关非常熟悉的南丁格尔小姐，放弃了个人的享乐，一心扑在慈善事业上。她接受了大英帝国战时国务大臣赫伯特勋爵请她前往近东照料英国士兵的恳求。已经颇有声望的南丁格尔小姐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她于1854年9月带领37位英国女士动身前往康士坦丁堡和斯卡特瑞，她们一到那儿就立即开始救护伤员。1855年斯坦丽小姐又带着60名女士加入了她的行列。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南丁格尔把爱奉献给了遭受痛苦的人们，以她那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而闻名于世。”她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杜南。

南丁格尔开创了战地救护的先河，成为“救护被疮（创）兵士之鼻祖”，自然也给杜南带来了灵感。受到启发的他，由此提出上述两大设想，成就了席卷全球的人道主义运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杜南对南丁格尔战地救护行动的推崇和弘扬，使她与红十字联系在一起，她是当之无愧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先驱。

别具匠心的“珠联璧合”

回到烟台红十字文化主题公园里的这尊雕塑。2024年7月，烟台市红十字会就“石柱上雕刻这三个人的头像是否合适”专门咨询笔者，笔者答称“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把南丁格尔放上去可能会有人质疑，但她确实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前驱。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并颁发的，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把她与红十字运动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也是一种创意，我表示赞赏”。

果然不出所料，这样的架构并没有取得共识，烟台的朋友明确提出把南丁格尔和杜南放置一起，他“代表国际红十字运动持异议。她是护理学先驱，不是红十字运动先驱，我们给他们颁奖并不代表她能和杜南先生并列到雕塑上”。

这样的争议也属正常，毕竟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杜南和南丁格尔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人道救助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二人都是红十字运动先驱的基本事实。杜南自不必说。南丁格尔虽然是国际护理界的前驱，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南丁格尔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但仍应强调的是，国际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07年第八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设立的，1912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首次颁发，以后每两年由红十字会遴选颁发一次。不难理解，国际红十字组织一直将南丁格尔视为红十字运动的前驱，并通过南丁格尔奖的设置弘扬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也是如此。早在1898年11月16日，《申报》发表文章介绍红十字会的缘起时就说：“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陷阵救护受伤兵士之善举也。其议创自英人，而瑞士人实成之。”所谓“其议创自英人”，是指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救护行动；所谓“瑞士人实成之”，是指杜南发起成立红十字组织的创举。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奠基人沈敦和在《人道指南》杂志的发刊词中追溯说：“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英法攻俄之战，英女士乃丁戴而（南丁格尔）亲临战地看护伤员，是为红十字之起点。后六年奥法之战，瑞士显理涂南（亨利·杜南）设会救护，严守中立，双方并施，军士之赖以全活者甚众，列强随之。越年遂缔盟于瑞士，定日来弗（日内瓦）条约，反瑞士国旗为红十字旗（按瑞士国旗红地白十字），遂以红十字名其会。”类似记载连篇累牍。在近代中国人的心中，南丁格尔、杜南都是红十字运动的前驱，没有不同的声音。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彼此拆分，想要楚界汉河，泾渭分明。如今，烟台红十字文化主题公园重新将二人“珠联璧合”，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可谓别具匠心。

（作者池子华，烟台海寰红十字学院执行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殷商龟甲在药肆尘封三千余年后重见天日，历史长河骤然翻涌起文明觉醒的惊涛。王懿荣，这位福山赤子以金石学者的卓识，在龙骨碎屑间破译出华夏文明的原初密码，令沉睡千年的甲骨文如惊雷裂空，将中华信史坐标重新锚定于商周之际。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绝非偶然的邂逅，而是文化基因与国家危局共振出的时代绝响。

翰墨流芳三百年 忠义传家十六世

古现河畔的千年槐荫下，琅琊王氏的血脉自周室姬姓开始蜿蜒流淌。自明洪武年间盐课大使王忠将“养素”家风根植胶东，这个家族便以诗书为骨、气节为魂，在东夷故地续写士族传奇。从东晋王导“乌衣巷口旧家风”的世家风范，到康熙御赐“忠孝仁义”的璽金匾额，这个家族以诗书为经、气节为纬，十六代人用文脉与脊梁编织出壮阔的精神图卷。140余位七品至一品官员的冠冕，终不敌九世祖王骥“做官致富不如贫”的醒世箴言；八世祖王道增开仓赈灾的义举，化作千年古槐的年轮里永不褪色的精神胎记。

在这片浸润着士大夫精神的热土上，少年王懿荣于青灯黄卷中铸就“读书志在圣贤”的魂魄。七试春闱的坎坷，反将“为官心存家国”的信念淬炼得愈发锋芒毕露。当《摹古楼藏器释文》的墨香惊动京华学界，当1500片甲骨在金石斋中渐次苏醒，这位胶东学子以学术脊梁，扛起了重塑中华文明谱系的历史重担。

甲骨裂云照汗青 碧血化虹耀苍穹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那个清晨，药铺里的龙骨碎片在王懿荣眼中迸发出文明的光芒。商王占卜的灼痕幻化为文字长河的源头活水，青铜铭文成为血脉相承的古老凭证。摩挲着浸润先民手泽的甲骨，他分明触到了华夏文明最深沉的脉动。《汉石存目》的考据，《古泉选》的甄鉴，五百万汉印在他的手掌中重获新生，一千五百片甲骨在案头娓娓低语，合力将中华文明纪年向前推移了整整十个世纪。

青龙山南麓的新馆内，编号“001”的龟甲在射灯下泛着神秘的幽光。刀笔镌刻的“雨”“王”“征”等字符，恍若商王武丁正借发现者之目俯瞰人间。展柜旁的电子屏上，甲骨拓片在数字洪流中幻化重生，恰似当年潍县商人范守轩展开布袋时，六百两百白银折射的晨曦微芒。

当甲午海战的硝烟染黄渤海波涛，这位金石巨擘却在书斋中砺剑待发。请纛奏折上的“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字字凝血，国子监祭酒的最后绝笔“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力透纸背。投井殉国的刹那，古现河水逆流倒卷，三千甲骨凌空炸响——这不是文人末路，而是士大夫精神最壮烈的涅槃。

纪念馆蜡像馆内，时空永远凝固在1900年的盛夏：峨冠博带的王懿荣立于井沿，谢夫人紧攥未竟的《天壤阁杂记》，张氏怀中的襁褓空悬——史载她托孤后从容赴死。三尊衣袂飞扬的塑像，恰似殷墟青铜器上永恒的雷纹。此刻顿悟：真正的不朽文字何须载体？当学者以血肉之躯篆刻气节时，他自身便成了最璀璨的文明图腾。

精神圣殿矗天地 文明薪火传千秋

如今的福山新城，2.6万平方米的王懿荣纪念馆巍然矗立。入口的浮雕墙上，武丁卜辞与发现者的诗稿穿越时空展开对话。展厅内的青铜爵幽光浮动，绝命词墨迹似未干透。全息剧场里，八国联军的铁蹄与甲骨金文激烈碰撞，迸溅出震撼时空的文明火花。

“文明之光”穹顶厅中，甲骨碎片汇成璀璨星河。触碰交互屏的瞬间，“日”“月”“光”等字符幻化飞升，在数字长河中溯源而上。教育剧场内，《甲骨惊雷》的沉浸式演出让观众与先贤直面：井栏前整肃衣冠的从容，“吾可以死矣”的决绝，“砍地泪纵横”的悲怆，皆化作穿越时空的精神电波。

暮色浸染河滨南路时，玻璃幕墙将现代建筑晕染成青铜鼎的沧桑轮廓。复建的“听松斋”内，孩童正用AR笔锋在虚拟龟甲上描摹“福”字。先人篝火下的考据心血，此刻化作展签二维码中的数据星河。这场始于药铺的文明苦旅，终在数字时代续写崭新篇章——正如那口吞噬生命的古井，终究托起了文字的永恒重生。

这座精神圣殿不仅是历史的陈列场，更是文明基因的培育皿。当孩童在拓印体验区按下首方朱砂印记，当青年学子于“士大夫精神论坛”激荡文脉，青铜鼎彝间似有欣慰的目光流转。先贤投井激起的涟漪，已化作文化自信的浩荡春潮，携甲骨密码奔向民族复兴的星辰大海。



甲骨文

投稿邮箱: ytrbzk@126.com